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现代英雄神话的回光返照——重读《北方的河》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6-10

[作者] 王一川

[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 我十年前读张承志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曾为它突破旧模式而描写全新人物的努力击掌欢呼。今天，当我自己和同时代人正与80年代精英文化的/“单语独白/”告别、而置身于世纪末新语境时，上述阅读印象是否会发生改变？

[关键词] 《北方的河》；文化语境；人文主义语境；英雄神话模式

我十年前读张承志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曾为它突破旧模式而描写全新人物的努力击掌欢呼。今天，当我自己和同时代人正与80年代精英文化的/“单语独白/”告别、而置身于世纪末新语境时，上述阅读印象是否会发生改变？我们知道，本文阅读总是与读者所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有关的，这种语境供给读者以特定的阅读动机、模式和目的，迫使他/“读/”到了这种意义而不是他种意义，同时，也使其他可能的意义遮蔽起来，推迟向他开放。而事过境迁，在别一种时代语境中，他读同一本文，却可能推翻原先的阅读而/“发现/”新的意义。有趣的是，同一本文竟引出了旧的意义和新的意义两种不同读解。那么，两者究竟何者正确或正宗呢？在我看来，一般地讲，如果两者确实都是从本文阅读中生长出来的，那就无所谓正确或正宗与否，而是都具有某种合理性。/“旧/”的虽然被/“新/”的/“颠覆/”，但并不轻易丧失存在理由，而是可以作为本文的意义之一而存在下去；同时，/“新/”的诚然打开了本文意义的新维度，带来阅读的生机，但也决不应被奉为唯一正宗，而是与/“旧/”的共存，分享本文阅读的多种合理性。由此，人们今天对《北方的河》的读解可能会发生与80年代初读时颇为不同的变化，应该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在我现在看来，这部中篇的出现，是同当时弥漫全国的人文主义语境紧密关联的。那时以精英旨趣为主的语境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降生。旧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由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典型如沈之菲（《流亡》）等开场，以50年代末的林道静为代表，都自觉背负深重的小资产阶级/“原罪/”，在卢嘉川式神圣帮手引导下全力/“赎罪/”，终于转型再生为历史/“主体/”。到80年代的秦书田、章永璘等，这种原罪—赎罪及转型再生模式虽在有力质疑下衰落，但尚未断绝。而《北方的河》的/“研究生/”出现，才终于给出一个鲜明的终结标志。/“他/”不再象其长辈那样臣服于卢嘉川式神圣帮手并在苦难中赎罪，而似乎全力追求个人的自由人生。自此以后，原罪-赎罪型知识分子就从文坛的中心退向边缘或者消隐了，取而代之，我们见到的应是一种新型人物形象。那么，今天看来，/“研究生/”是否依旧称得上新的人物或新型知识分子典型的辉煌开端呢？重读本文，我发现了自己过去不曾觉察的悖论。主人公/“研究生/”的全部理想和行动不外是寻找/“北方的河/”。从本文描述看，/“北方的河/”这一表述是概指中国北方的所有大江长河。不过，在那位主人公无意识里，它或许应是/“父亲/”的象征。因为/“他/”一再忘情地说/“这黄河象是我的父亲/”，并一惜一切地去寻找。如此说来，他的/“寻河/”行动实际上就相当于/“寻父/”行动。那么，小说中一再出现的/“父亲/”又指的是什么？/“他/”曾满怀愤怒地说过：我从小没有父亲，那个人把我妈甩啦；并不惜运用脏话大骂/“这个狗杂种/”。/“他/”多年的愿望就是报仇。显然，/“父亲/”对于/“他/”来说，虽然是亲生血缘父亲，但更重要的是宿敌。/“寻父/”的堂皇动机中正包含着隐秘的复仇即弑父冲动。面对黄河，他虽然也热烈地礼赞新的/“黄河父亲/”，但在心里却又恶狠狠地咒骂他。所以，不妨这样说，他的/“寻父/”行动具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在意识层面是认父，而在无意识里又充溢弑父火焰。即，他意识里是要向父亲认同，而无意识里却是要弑父。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调解的悖论。这个悖论的影响是重要的。这样才可以理解，/“他/”何以如此狂怒地仇视父亲，又如此强烈地渴望横渡黄河。渡河，在他意识中是与新的黄河父亲认同，而在无意识层面却是征服宿敌父亲，是弑父。认父冲动和行动与弑父冲动和行动就这样悖论式地纠缠在一起。渡河场面正是这种悖论的一次集中的仪式性展示。当然，不妨说得准确点，渡河可以视为一次洋溢浪漫气息的象征性弑父行动。弑父的目的应是/“成人/”，即成就为新型人、或新型的完整人。但由于父亲是/“他/”成为独立、自主与创造性个体的最大障碍，更是/“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的摧残者，因而不弑父无以成人。于是，弑父行动就成为/“他/”的/“成人礼/”。这庄严而伟大的行动在庄严而伟大的黄河上举行。横渡那狂放不羁的黄河，不正

是象征性弑父行动和新型人的成人仪式么？然而，同样应当看到的是，当/“父亲/”形象在本文中同时意指新型人的反叛对象与认同目标时，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价值清晰而是价值混乱了。而这一点显然正导源于前面提到的那个纠缠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悖论。有意识认父与无意识弑父的悖论模糊了新型人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模糊既存在于人物之中，由此显示，又存在于作家本人心中。更进一步看，主人公的寻父行动所依托的不是清醒的合理性筹划，而主要是充满浪漫色彩的/“诗/”和/“梦/”。/“研究生/”除了书本寻求外，总是在写诗和做白日梦，在自恋中蔑视徐华北等的实际生存行动。这种浪漫梦想极大地损耗主人公的现实的合理的行动能力。新型人生倘只能在/“诗/”与/“梦/”中实现，那就必然更多地是乌托邦式的。实际上，在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中考虑，这不过是世纪初开始的/“英雄神话/”模式的一次重写。以梁启超的黄克强（《新中国未来记》）和陈天华的狄必攘（《狮子吼》）为开端，这种模式强调以具有原创性、神圣性和感召力的英雄典型，对/“蒙昧/”大众实施/“现代性/”启蒙，以便促成这种现实英雄的普遍降生，从而尽快重建起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但是，这些英雄往往在/“梦/”境现形，缺乏现实根基，更无法启蒙大众，乌托邦色彩浓烈（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章）。/“研究生/”重新落入这一窠臼。可以说，/“研究生/”虽然突破原罪一赎罪模式，却又回返更早的英雄神话模式。而这两种模式都不过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传统的不同表述形态，这种传统力求创造精英色彩浓厚、能启蒙大众的主人公，但往往高扬主观性（此处无法展开）。到80年代，这种传统虽见复苏却不足以避免衰落命运，尤其受到新语境所弥漫的新人物创造冲动的挑战。但/“研究生/”并没有真正显现出这个时代的新人价值取向，从而无缘成为新人物的开场，而只是上述20世纪传统尤其是其英雄神话的回光返照。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我们冷静地反省80年代/“人的浪潮/”及整个精英文化的普遍症候：历史性地把/“人/”呼唤出来却无以安置，思想启蒙远胜于现实行动等。这样说不是要苛求于80年代，而是要在批判视界上吸取和超越它。至于真正摆脱这种传统而指向新世纪的新人物雏形，我以为要到王朔式作品中才完整地然而又充满迷雾地亮相，这需另文论述了。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